

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

王立新

内容提要 自18世纪末期以来,美国人在界定自身文化身份时将欧洲视为美国的对立面和文化“他者”,信奉的是“美国例外”论;在思考美国的地缘政治特性时,把欧洲视为威胁,奉行的是远离欧洲纷争和排斥欧洲影响的大陆主义。一战后,美国精英逐渐用突出美欧文化同源性和一致性的“西方文明”叙事取代“美国例外”论,用强调美欧休戚与共的“大西洋共同体”观念瓦解大陆主义,从而完成了美国文化与地缘政治身份的重塑。二战后,美国利用这一新的国家身份观念,把实施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约解释为保卫“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体”,从而维护美国自身文化存续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步骤,成功地将美国与西欧凝聚成文化、意识形态与安全共同体,最终打造出一个新“西方”。

关键词 美国国家身份 西方 美国例外论 大陆主义 西方文明 大西洋共同体

“西方”无疑是当代国际关系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与“东亚”、“中东”、“第三世界”等词语并列,成为观察、理解和分析国际政治的重要概念。当代意义上的“西方”通常指由西欧人建立的一组国家,包括西欧诸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组国家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相似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发达的经济,信奉以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同时,这组国家在外交和安全问题上相互协商、共同行动,并结成了以北约为中心的安全同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没有加入北约,但通常采取与北约协调一致的安全政策,并支持北约的军事行动)。概言之,当代语境下的“西方”指的是由美国领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体。

这一共同体并非自古就存在的,而是在冷战初期形成的。作为反映欧洲人世界观的重要概念,“西方”的含义在历史上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古代,“西方”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罗马帝国的西部。基督教大分裂之后,“西方”被赋予了一定的宗教含义,指“拉丁罗马教会”,与“东方正教会”相对。殖民主义兴起后,与欧洲征服对象——“东方”相对的并不是“西方”,而是“欧洲”,白种人居住的欧洲被认为代表着“文明”和“进步”,优越于“野蛮”和“落后”的“东方”,因此有权对“东方”进行“教化”和殖民。19世纪中期,俄罗斯知识分子用“西方”指称经历了启蒙与革命、完成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西欧,“西方”开始被赋予文化与政治意涵。随着欧洲内部的分裂和冲突,俄罗斯人发明的“西方”这一概念在19世纪晚期逐渐取代“欧洲”,被西欧人所接受,成为界定和描述西欧诸国文化与政治身份的核心术语。直到一战前,“西方”仅是指西欧国家,主要是英法两国,美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西方”的一部分。甚至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多数美国人仍然把美国与欧洲对立,坚信“美国例外”,主张孤立主义。德国更是英法的宿敌,并相信德意志“文化”优越于英法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直到二战后,美国和德国才最终加入“西方”,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其标志是以

北约为支柱的大西洋同盟的形成和联邦德国加入北约。^①

在“西方”含义演变和当代意义上的“西方”形成过程中,美国的加入无疑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传统的研究主要从冷战初期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视角理解美国加入“西方”、构建大西洋同盟的过程,把美国放弃对欧洲的孤立主义、加入欧洲力量结构和组建北约视为对苏联威胁的反应和冷战背景下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战略。这一解释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充分。因为按照地缘政治逻辑,苏联毕竟与美国相距遥远,对欧洲的威胁并不意味着对美国的威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也曾出现希特勒威胁整个西欧的局面,当时美国却拒绝干预欧洲的局面。二战后的苏联虽然是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手,但美国可以采取在国内清剿共产党同情者、加强西半球的防御、把共产主义挡在国门之外的政策,或采取“离岸平衡”的战略,而不必通过与欧洲结盟、在欧洲驻扎常备军的方式来抵制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在一战后正是这样做的。按照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解释,随着苏联作为美国地缘政治威胁和意识形态对手消失,大西洋同盟应该解体,一些学者在冷战终结时也是这样预测的。^②但北约不仅在苏联解体后长期存在而且不断扩大,至今也没有解散的迹象。这表明单纯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视角来理解大西洋同盟的形成是不够的。实际上,纯粹的地缘政治算计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也无法在二战结束后短短的几年间说服天然具有孤立主义倾向、长期反对美国卷入欧洲事务的美国民众支持美欧关系的革命性变化,特别是让美国承担起保卫西欧诸国的重任,毕竟共产主义已经存在多年,苏联的威胁也并非迫在眉睫。因此,还需要从更广阔和更长远的视野来看待美国加入“西方”的问题。实际上,北约成立之前,美国人就已经认识到美国与西欧各国是具有共同文明传统的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而这种认知是自一战以来美国精英重塑美国的文化与地缘政治身份的结果。美国决策者之所以能够突破民众孤立主义思想的束缚、同西欧结成军事同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正是这种重塑逐渐改变了美国人对美欧之间文化与利益关系的理解,并为冷战初期美国构建大西洋同盟打造了情感和心理基础。

自18世纪晚期以来,美国人在界定自身文化身份时一直强调美国文化的独特性,信奉将欧洲视为文化“他者”的美国例外论;在思考自身安全的时候,则把欧洲视为危险的来源和美国安全的威胁,实行的是远离欧洲和排斥欧洲的大陆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不过,从美国加入一战开始,美国精英逐渐用讲述美欧文化同源性和一致性的“西方文明”叙事取代“美国例外”思想,用强调美欧休戚与共的“大西洋共同体”想象瓦解了以欧美对立为核心的大陆主义地缘政治叙事,并在冷战初期通过把保卫“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体”与美国自身文化存续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论证美国援助欧洲和建立北约的正当性,成功地将美国与西欧凝聚成文化、意识形态与安全共同体,最终打造出一个新

① 关于“西方”含义的演变,可参见贾斯帕·特拉奇(Jasper M. Trautsch, “The Invention of the ‘West’”),《德国历史研究所学报》(*Bulletin of the GHI*)2013年第53期,第89—102页;戴维·格雷森《从柏拉图到北约:西方观念及其反对者》(David Gress, *From Plato to NATO: The Idea of the West and Its Opponents*),自由出版社1998年版。

② 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斯·沃尔兹。沃尔兹在苏联解体后宣称“从历史和均势理论我们得知,赢得胜利的同盟在战争结束的翌日便会解体,如果是决定性的胜利就更会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有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肯尼斯·N. 沃尔兹《正在形成的国际政治结构》(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迈克尔·E. 布朗等编《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当代现实主义与国际安全》(Michael E. Brown, et al.,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4页。

“西方”。本文尝试考察这一过程,为理解“西方”的形成提供新的维度。^①

另外,本文并非对“西方”形成的政策史研究,而是把大西洋同盟的建立和“西方”的形成视为长期的话语建构的过程,因此没有讨论相关国家的决策过程和战略考量,而是集中考察美国精英如何发明新的身份叙事重新阐释美欧关系,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新叙事来论证建立大西洋同盟的正当性。换言之,本文是关于大西洋同盟建立的话语政治研究而非政策过程研究。

一、例外论、大陆主义与美欧之间的对立

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美国的种族和族群构成异常复杂多元,不同族群之间没有共同的血缘和经历。美国立国时间较短,缺乏英法和中国那种贯穿古今的悠久文化传统。美国甚至缺乏从祖先那里继承的稳定的国土,其疆域曾多次发生变化,并不断有大量新移民涌入。因此,美国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解释和自我发现,构建国家身份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文化工程”。早在独立战争时期,来自法国的纽约居民埃克托尔·克雷弗克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美国人,这个新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呢?”^②这就是关于美国文化身份与国民特性的所谓“克雷弗克之问”。“克雷弗克之问”此后不断地被美国历史学家、政治家,甚至小说家和诗人提出和回答,几乎每一代美国人都会讨论这一问题。历史学家托马斯·哈茨霍恩曾感叹说,“美国人远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关心自己的国家身份,花更多的时间来向自己解释自己”。^③

早期美国移民主要来自西欧,英法等国在北美从事的殖民和定居活动塑造了北美社会的面貌,美国与欧洲特别是西欧在文化、习俗和价值观等方面有很多相似性。但是,这一现在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却长期遭到美国人的否认。在整个19世纪,美国人并不承认美国与欧洲在文化上的亲缘性和相似性,而是强调美国制度和文化的独特性。在一战前,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身份叙事是美国例外论。例外论的主要思想之一就是美国与欧洲的不同,甚至对立。根据这种例外思想,新旧大陆在价值观、政治制度、行为方式等方面是截然不同的,美国是一个崭新的国家,是对欧洲的否定和超越,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新方向。历史学家伊恩·蒂勒尔言道,“‘欧洲’与‘美国’的二元对立是美国例

-
- ① 已有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从思想史或建构主义的视角考察“西方”含义的演变。“西方”的概念和话语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冷战初期美国如何利用“西方文明”叙事把德国纳入西方阵营,这些著作给笔者以启发并构成本文写作的知识基础。但这些研究还未能从美国国家身份转换和塑造的角度关注美国的“西方化”过程及其与大西洋同盟构建之间的关系。相关著作主要有:戴维·格雷斯《从柏拉图到北约:西方观念及其反对者》;杰辛塔·奥黑根《国际关系中西方的概念化:从施本格勒到萨义德》(Jacinta O'Hagan, *Conceptualizing the W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Spengler to Said*) 帕尔格拉夫—麦克米伦公司2002年版;阿拉斯泰尔·邦尼特《西方观念:文化、政治与历史》(Alastair Bonnett, *The Idea of the West: Culture, Politics and History*) 帕尔格拉夫—麦克米伦公司2004年版;帕特里克·杰克逊《教化敌人:德国重建与西方的发明》(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Civilizing the Enemy: German Reconstruction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West*)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马科·马里亚诺编《界定大西洋共同体:20世纪中期的文化、知识分子和政策》(Marco Mariano, ed., *Defining the Atlantic Community: Culture, Intellectuals, and Policies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劳特里奇出版社2010年版。
- ② J. 埃克托尔·克雷弗克《一个美国农场主的信及其对18世纪美国的更多描述》(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and more Sketches of XVIIIth Century America*) 艾伯特·斯通(Albert E. Stone)编辑整理 纽约达顿公司1981年版,第69页。
- ③ 托马斯·L. 哈茨霍恩《对美国性格的新解释》(Thomas L. Hartshorne, “Rec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merican Character”) 杰斐逊·B. 凯洛格、罗伯特·H. 沃克合编《美国研究资料》(Jefferson B. Kellogg and Robert H. Walker, eds., *Sources for American Studies*) 格林伍德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页。

外思想得以形成的熔炉”。^①

埃克托尔·克雷弗克在1782年回答他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时也是把美国与欧洲相对照,强调美国人是与欧洲人不同并超越了欧洲的“新人”,这一新人“把一切古老的偏见和习惯丢在一边,从他们所拥有的新的生活方式中,从他们服从的新的政府中,也从他们所处的新的地位中接受了新的见解和习惯”。^② 克雷弗克还把欧洲与美国相对立:欧洲代表暴政、堕落、等级制、贵族制、贫穷、压迫、不宽容、财富向少数人的过度集中;而美国代表自由、尊严、平等、民主、繁荣、机会、宽容、勤劳和财富的公平分配。克雷弗克声称:北美是一个“新大陆”,是一个“现代社会”,与欧洲“截然不同”,“这里没有贵族家庭,没有宫廷,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教会领地,没有极少数显赫人士享有的隐形权力,没有雇佣成千上万工人的大工业,没有昂贵的奢侈品”。简言之,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会”,是“自由的避难所”和“贫穷痛苦的欧洲人的收容所”。^③

与欧洲旧制度和旧生活方式决裂是革命一代人共同的抱负,他们决心在新大陆建设一个新社会。由于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的成就无法与欧洲相比,美国建国一代主要强调美国在政治制度、个人权利、阶级关系、社会生活等方面不同于欧洲,并将这些方面视为美国社会独特性和优越性的标志。在美国人心中,欧洲盛行暴虐的君主制,自私的君主剥削大多数人民,普通人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美国则奉行共和主义,正在进行公民自治的伟大试验,政府的目的是促进公共福祉。欧洲存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对个人自由的压迫以及沉重的债务和税收负担;而美国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各级政府致力于保护公民的自由,没有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压迫。欧洲是一个矫揉造作、腐败、堕落的社会;美国则是一个淳朴、纯真、充满朝气的社会。杰斐逊在1787年12月20日给麦迪逊的信中强调,美国的政府是“清廉公正的”,欧洲政府是“腐败堕落的”,美国人主要从事农业,欧洲人主要生活在城市,美国不能走欧洲的道路,否则会像欧洲那样“腐败”和“相互腐蚀”。^④ 杰斐逊还反对美国人去欧洲留学,认为年轻人到欧洲学习有种种弊害:“喜欢欧洲人的奢侈和挥霍,轻视自己国家的俭朴;会深深迷恋欧洲贵族的特权,厌恶本国穷人享有的与富人的平等地位;会对贵族政治或君主政治特别偏爱”,乃至“回到自己的国家后会成为一个外国人”,“失去知识,失去道德,失去健康,失去好的习惯,失去幸福”。^⑤

伴随着美国向西挺进,美国在北美大陆建设一个新文明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大陆扩张和西进运动是一个越来越远离欧洲以及把欧洲影响逐出北美大陆的过程。在19世纪中期的浪漫主义者看来,美国的建立就是与欧洲的决裂,就是把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的过去都抛在后面,去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浪漫主义者约翰·奥萨利文称美国的诞生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开端”,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同”,“与其他任何国家过去的历史几乎都没有关联”,美国“与过去分离而只与未来相连”,“注

① 伊恩·蒂勒尔《“美国例外论”究竟是什么?》(Ian Tyrrell, “What, exactly, i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星期》(The Week)2016年10月21日。http://theweek.com/articles/654508/what-exactly-american-exceptionalism 2017年4月5日

② J. 埃克托尔·克雷弗克《一个美国农场主的信及其对18世纪美国的更多描述》,第69—70页。

③ J. 埃克托尔·克雷弗克《一个美国农场主的信及其对18世纪美国的更多描述》,第37、67页。

④ 乔伊斯·阿普尔比、特伦斯·鲍尔编《杰斐逊政治文集》(Joyce Appleby and Terence Ball, eds., *Jefferson: Political Writings*),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页。

⑤ 乔伊斯·阿普尔比、特伦斯·鲍尔编《杰斐逊政治文集》,第247—249页。

定是代表未来的伟大国家”。^①

历史学家无疑是美国国家特性和身份意识的主要阐释者。在一战前,特纳的边疆假说是对美国国家特性和文化身份最有力、影响最大的阐释。用美国著名的思想史家雷·比林顿的话说,特纳的理论是对克雷弗克之问“最广为接受,同时也引起激烈争论的回答”。^②特纳强调美国制度与文化的独特性,认为美国的文化和制度不是欧洲的复制和延续,而完全是崭新的现象,是对新大陆出现的独特条件和环境,特别是西部荒野做出反应的产物。他断言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来自欧洲而是在美国西部锻造出来的。“我们的民主制度史既不是仿效别人的,也不是简单借用的。它是政治有机体的器官在对付变化的环境时发生演变和适应的历史,即一种新的政治物种的起源史。”^③特纳1914年在华盛顿大学毕业典礼致辞时更进一步指出:

美国的民主不是诞生于理论家的梦想,不是从苏珊·康斯坦号带到弗吉尼亚的,也不是从五月花号带到普利茅斯的,它来自美国的森林,每当它接触到新的边疆的时候都会获得新的力量。^④

特纳的边疆假说一经提出,就得到广泛的接受。到20年代,美国历史学会已经变成“一个大的特纳协会”,“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结束这一时期,边疆假说实际上是美国史学无可置疑的圣经”。^⑤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话说,“在美国人关于美国历史的看法中,边疆命题居于支配地位”。^⑥特纳边疆假说的影响远远超出史学界,经济学、政治学和地理学开始关注边疆的作用,美国文学领域也产生一大批关于中西部边疆的作品,普通民众对美国制度与文化的理解也受到边疆理论的影响。

大体而言,从美国建国到卷入一战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否定与欧洲的文化联系、突出欧美之间的差异和对立来构建美国的文化身份与国家认同,欧洲被视为美国的文化“他者”和对立面。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所言,在美国,一直到20世纪初,“‘美国’与‘欧洲’与其说是两个严格的地理名词,不如说是两个逻辑上截然相反的对立物”,正是“与‘欧洲’之间的简单对立培育了笼统的美利坚主义(Americanism)概念”。^⑦

与例外主义文化身份观相关联的是大陆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大陆主义把美国的地理位置、制度

① 约翰·奥萨利文《未来的伟大民族》(John L. O'Sullivan, "The Great Nation of Futurity"),《美国民主评论》(*The United States Democratic Review*)第6卷,1839年第23期,第426页。

② 雷·艾伦·比林顿《边疆如何塑造了美国性格》(Ray Allen Billington, "How the Frontier Shaped the American Character"),《美国遗产》(*American Heritage*)第9卷,1958年第3期,第4页。

③ 弗雷德里克·J·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Frederick J.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亨利·霍尔特公司1920年版,第205—206页。

④ 弗雷德里克·J·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第293页。

⑤ 雷·艾伦·比林顿编《边疆命题:对美国历史的有效解释?》(Ray Allen Billington, ed., *The Frontier Thesis: Valid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罗伯特·克里格公司1977年版,引言第2页。

⑥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特纳与边疆神话》(Richard Hofstadter, "Turner and the Frontier Myth"),《美国学人》(*The American Scholar*)第18卷,1949年第4期,第433页。

⑦ 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与欧洲的形象》(Daniel J. Boorstin, *America and the Image of Europe: Reflections on American Thought*),子午线图书公司1960年版,第19—20页。

特征和国家理想融合在一起,包含以下三方面思想:第一,浩瀚的大西洋把西半球与欧洲分隔开来,并构成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使新旧大陆分属不同的地理和政治体系,美国的利益集中在西半球。第二,欧洲是一个充满暴政和不断爆发战争的凶险之地,是对美国乃至整个西半球安全的威胁,美国必须避免卷入欧洲的事务,同时也要防止欧洲介入和干涉美洲的事务。第三,美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北美大陆是上帝留给美国进行伟大共和试验的舞台,美国应该占领除加拿大以外的整个北美大陆,并在此建立一个与欧洲不同的独特的美利坚文明。^①大陆主义具有很强的地理决定论色彩,培育了一战前美国人的国家安全观念和对外关系思想,包括“美洲体系”思想、互不干涉原则、西半球观念、“天定命运”思潮,而这一切都构成孤立主义的思想基础。

“美洲体系”思想认为,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政治上,美洲和欧洲都分属不同的体系,实行不同的制度,因而有不同的利益。潘恩在鼓吹独立的小册子《常识》中提出北美是一个大陆,而英国是几个岛屿,“显而易见它们是属于不同的体系的,英国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本身。”^②杰斐逊在1811年9月16日给克莱门特·凯恩斯的信中谈道,美洲作为“两面都被广阔的大洋与地球另一半隔离开来的”“半球”,因为“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土壤、不同的产出、不同的生存方式以及在当地的种种联系和责任”而“具有不同的利益体系”,不能“屈从于地球另一半微不足道的利益、法律、规则、情感和战争”。^③杰斐逊在1813年12月6日给亚历山大·亨伯特的信中再次强调,“欧洲各国属于地球上单独的部分,它们的地理位置使其采取截然不同的制度。……美洲有自己的半球,它必须有自己单独的利益体系,这一体系绝不能从属于欧洲的利益”。^④

从“美洲体系”思想衍生出来的就是互不干涉原则。既然欧洲与美洲分属不同的体系,那么新旧大陆奉行的国际关系准则也是不一样的,欧洲的制度 and 原则不能强加给美洲,美洲各国也不会介入欧洲的事务。杰斐逊在1823年10月24日给门罗总统的信中提出南北美洲有一套与欧洲不同的利益和制度,“欧洲力图成为专制主义的居所,而我们则努力使我们的半球成为自由的家园”,因此“我们首要的、根本的行为准则应该是绝不卷入欧洲的纷争,我们第二条准则是决不允许欧洲干涉大西洋这边的事务”。^⑤门罗总统在1823年以国家政策的形式阐述了美洲体系和互不干涉的原则。詹姆斯·波尔克总统在1845年12月又重申门罗宣言的原则,称“美洲体系”和“欧洲体系”是不一样的,欧洲体系奉行的是“力量均衡”的原则,而美洲体系坚持主权、独立与平等的原则。美国“从未卷入欧洲国家国内的纷争,……从未试图通过阴谋、外交或武力来传播我们的政府形式”,因此“有权要求本大陆也同样免于欧洲的干涉”,“今后没有我们的同意,任何欧洲国家不得在北美大陆的任何地区开

① 有学者把美国大陆主义概括为三个方面:地理决定论、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与欧洲相分离以及在对外事务中独立行动。查尔斯·维威尔《美国大陆主义:一种扩张理念(1845—1910)》(Charles Vevier, “American Continentalism: An Idea of Expansion, 1845—1910”),《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65卷,1960年第2期,第333页。

② 托马斯·潘恩著、马清槐等译《常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页。

③ H. A. 华盛顿编《托马斯·杰斐逊文集》(H. A. Washington, 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第6卷,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4页。

④ 安德鲁·A. 利普斯科姆编《托马斯·杰斐逊文集》(Andrew A. Lipscomb, 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第14卷,美国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学会1903年版,第22页。

⑤ 阿德里安娜·科克、威廉·佩登合编《托马斯·杰斐逊生平著作选》(Adrienne Koch and William Peden, eds., *The Life and Selected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兰登书屋1944年版,第708页。

拓或建立殖民地或领地。”^①门罗主义背后的思想是新旧大陆的对立。

从大陆主义还发展出“西半球观念”。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流行的西半球观念的核心是“认为西半球各民族有特殊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整体,这使他们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相分离。”^②西半球的整体性首先体现在地理空间上的一体性及其与欧洲的隔离。拉美各国独立后,这种整体性或统一性被政治制度的相似性、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所充实。西半球各国被认为拥有相似的反对欧洲殖民主义的经历和不同于欧洲君主制的共和制度;在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西半球各国都面临来自敌视共和制度的欧洲帝国的威胁,因此美洲各国之间在安全上应该是天然的盟友。门罗主义实际上把西半球视为安全上休戚相关的整体,相信美国的安全边界不是北美大陆,而是整个西半球,欧洲对西半球任何国家的控制都是对美国的威胁。这种“西半球观念”成为后来泛美主义的思想基础,直到1915年12月,美国国务卿罗伯特·蓝辛在第二届泛美科学大会上仍然强调“地理上的孤立”、“相似的政治制度”和“共同的人权观念”使西半球国家结为一体。^③

“天定命运”论是19世纪中后期美国最流行的地缘政治叙事。“天定命运”论把北美大陆描绘成上帝委托给美国人进行共和试验的实验室,因此注定为美国所占领。1811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在给父亲约翰·亚当斯的信中称,“整个北美大陆似乎注定被上帝交给一个民族来居住,说同一种语言,实行具有共同的宗教与政治原则的制度,适应共同的社会风俗和习惯。”^④“天定命运”思想最集中的表达是约翰·奥萨利文就英美俄勒冈争端在1845年12月27日的《纽约晨报》发表的文章。奥萨利文称,美国“不断扩张并占有整个北美大陆”是美国的“天定命运”,“这个大陆已经由上帝赐予我们来进行托付给我们的自由和联邦自治政府的伟大实验”,在上帝的保佑下,美国人会“毫无畏惧地履行上帝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⑤另一位“天定命运”论鼓吹者、曾担任科罗拉多领地总督的威廉·吉尔平称,密西西比河流域“是上帝为人类挑选出来的最宏伟壮丽的居所”,“作为一个整体交给美国人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恩赐”。^⑥

“天定命运”论把美国向西扩张和拓殖的过程视为驱逐欧洲殖民主义影响和远离欧洲干扰的过程,移民越涌向西部,边疆越向西流动,美国的核心地区距离欧洲越遥远。就此而言,“天定命运”论与门罗主义在思想上实际上是相通的:都相信欧洲的影响是对美国利益和安全的威胁。

更重要的是,在“天定命运”论鼓吹者看来,美国向西扩张是为了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的新文明,丰富的资源、广袤的土地、越来越多的移民的涌入和美国“优越”的政治制度使北美大陆成为新文明的中心和新秩序的舞台,将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独特的作用。威廉·吉尔平1846年

-
- ① 《詹姆斯·波尔克首个年度咨文》(“James K. Polk’s First Annual Message”),<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9486> 2017年4月7日。
 - ② 阿瑟·P. 惠特克《西半球观念的起源》(Arthur P. Whitaker, “The Origin of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dea”),《美国哲学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第98卷,1954年第5期,第323页。
 - ③ 约翰·巴塞特·穆尔《美国外交的原则》(John Bassett Moore, *The Principles of American Diplomacy*) 哈珀兄弟公司1918年版,第400页。
 - ④ 沃尔特·A. 麦克杜格尔《应许之地、十字军国家:1776年以来美国与世界的相遇》(Walter A. McDougall,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 霍顿·米夫林公司1997年版,第78页。
 - ⑤ 朱利叶斯·W. 普拉特《“天定命运”的起源》(Julius W. Pratt, “The Origins of ‘Manifest Destiny’”),《美国历史评论》第32卷,1927年第4期,第796页。
 - ⑥ 威廉·吉尔平《核心黄金区:北美的谷物、畜牧和黄金区》(William Gilpin, *The Central Gold Region: The Grain, Pastoral and Gold Regions of North America*) 索尔和巴恩斯公司1860年版,第119页。

在联邦参议院发表演讲,称“征服这块大陆”是“美国人民不可让渡的命运”,美国通过建设这块大陆来完成上帝交给美国的如下“不朽的使命”:

把自治的原则付诸实践;……为人类生活建立新秩序;解放受奴役的人们;让衰老的民族重新焕发生机;把黑暗改造成光明;……确定人类未来的命运;将人类的事业带到最高点;使停滞不前的民族获得新生;让科学的发展臻于完美;为人类增添新的辉煌荣耀;让永久和平装点人类的历史;把整个世界联合成一个社会大家庭;消解专制的魅力,提高博爱的荣耀;解除人类背负的沉重诅咒,把(上帝的)赐福带到全世界。^①

19世纪后期的大陆主义者把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视为“美国的地中海”,主张建立横跨北美大陆和贯穿南北美洲的铁路,在中美地峡修建运河,打通北美与亚洲和太平洋之间的海上通道,控制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把美国建成一个大陆帝国。^②

大陆主义把北美大陆和西半球视为国家战略的中心和美国发展的舞台,把关注的焦点从大西洋转向北美大陆,特别是美国西部。但其主题仍然是跨大西洋关系,背后的思想是新旧大陆的对立。用路易斯·哈茨的话说,早期美国人相信,美国之真正美好的前景“在于摆脱一个只能给美国社会注入糟粕的颓废的‘旧世界’”。^③大陆主义通过新旧大陆的对立来构建美国的地缘政治身份,实际上是把大西洋视为阻止欧洲干涉美洲的“护城河”,相信只要西半球安全,美国就安全。通过界定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安全边界,大陆主义成为整个19世纪美国地缘政治信条和国家安全政策指南。正是在此基础上,美国在一战前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对欧关系中一直奉行孤立主义原则。联邦国会众议员乔治·本德1940年的一句话浓缩了这一原则:“坚决让欧洲远离美洲,让美洲远离欧洲”,“把我们国家的命运与欧洲国家的命运相分离”。他称这一直是“我们对外关系的基石”。^④

威尔逊试图超越大陆主义和孤立主义,扩大美国安全的含义和范围:安全不应该是大陆主义所坚持的西半球安全,而是民主制度的安全。威尔逊在对德宣战咨文中虽然谈到了德国无限制潜艇战践踏美国的中立权利,造成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并没有把德国视为美国国土和西半球安全的威胁,而是突出普鲁士专制制度的邪恶,把德国描绘成民主制度、人类权利和世界秩序的敌人,威胁到比北美大陆和西半球范围要大得多的世界共同体和人类文明。威尔逊谈论较多的是“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和美国在捍卫国际共同体福祉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国土安全”。在威尔逊看来,稳定的国际秩序是保卫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可靠途径,也就是说,“让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全”(威尔逊在对德宣战咨文中提出的战争目标)就是让美国在世界上享有安全。亨利·鲁斯1941年2月在他那篇《美国世纪》的雄文中详细讨论了这种安全观。他指出,“国土防御”这个词本身“充满欺骗和自我欺骗”,实际上已经过时了,美国的安全是指民主制度的安全,而不仅仅是国土的安全,

① 威廉·吉尔平《北美人民的使命》(William Gilpin, *Mission of the North American People*) J. B.利平科特公司1873年版,第124页。

② 查尔斯·维威尔《美国大陆主义:一种扩张理念(1845—1910)》,《美国历史评论》第65卷,1960年第2期,第327页。

③ 路易斯·B.哈茨《美国的自由传统》(Louis B.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哈考特和布雷公司1955年版,第286页。

④ 乔治·H.本德《1940年的挑战》(George H. Bender, *The Challenge of 1940*) 纽约1940年版,第93页。

既然希特勒的目标是消灭民主制度,那么美国实际上已经处在战争之中了,“不是为了保卫美国的领土”,而是“为了捍卫,甚至在全世界促进、鼓励和激发所谓的民主原则”。^①

但是,威尔逊等人试图突破大陆主义界定的国家安全观念,把美国安全从保卫国土扩大到保卫民主的努力遭到强烈反对。国会在一战后拒绝让美国加入国联,拒绝向法国提供安全保障。美国人眼中的国家安全就是北美大陆和海外属地的安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观念又回到了大陆主义,即:西半球的安全就是美国的安全,大西洋作为天然的地理屏障可以继续保障美国享有“免费的安全”,避免卷入欧洲事务是美国安全的最佳保障。有“美国外交史学之父”之称的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塞缪尔·比米斯在1936年的著作中赞扬“大陆地位一直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力量之所在,美国外交的成功一直基于大陆政策,今天美国的利益也依赖于这一地位和政策”。^②《纽约时报》的编辑汉森·鲍德温在1939年夏天仍坚称“我们的大陆和半球坚不可摧,任何军事进攻都不可能获得优势”。^③

不仅如此,一战的经历还使美国人相信,对海外贸易的依赖也会使美国卷入战争。大陆主义者主张应该减少美国与欧洲和亚洲的贸易,在美洲建立自足的经济体系,专守大陆防御。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罗伯特·塔夫脱声称,“从贸易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几乎可以自给自足”。^④

比尔德是两次大战之间大陆主义最有力的鼓吹者。在1940年出版的《为美国提出一项外交政策》一书中,比尔德这样概括其大陆主义外交思想:美国的利益集中在美洲大陆,美国应该致力于在美洲建立一个美国人独有的、弘扬美国遗产的美利坚文明;不干涉欧洲和亚洲的冲突与战争,同时抵制欧洲和亚洲强国对西半球的干涉以及将其制度传播到西半球和在西半球建立帝国的野心。^⑤在安全领域,比尔德认为美国军队的责任就是“保卫国土和家园”“免遭外来的侵略”,而不是维护民主和国际共同体的安全,“国防意味着保卫美国的遗产——这个大陆上的土地、人民和制度”,最多扩展到夏威夷和运河区。^⑥在贸易领域,应该致力于在西半球建立封闭的贸易圈,减少对出口和对外投资的依赖,以免为了保护海外投资而卷入国外的战争。比尔德称:“实现美国安全与繁荣的最佳手段是最有效地利用美国的物质资源和技术,同时尽可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⑦“美国企业扩张的边界应该在美洲大陆内,而不是想象中的印度或莱茵河、多瑙河和维斯瓦河。”^⑧

比尔德反对国际主义者的外交观念,认为国际主义者把国际政治视为独裁与民主、专制与自由之间的对立并追求通过促进民主来实现持久和平,是极端错误的。比尔德提出,大陆主义者拒绝对

① 亨利·R. 鲁斯《美国世纪》(Henry R. Luce, “American Century”),《生活》(Life)第10卷,1941年第7期,第62页。

② 塞缪尔·弗莱格·比米斯《美国外交史》(Samuel Flagg Bem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亨利·霍尔特公司1936年版,第809页。

③ 汉森·鲍德温《不可战胜的美国》(Hanson Baldwin, “Impregnable America”),《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第47卷,1939年第187期,第267页。

④ 《罗伯特·塔夫脱1941年5月17日的广播讲话》(“Robert Taft’s Radio Address”),小克拉伦斯·E. 旺德林编《罗伯特·塔夫脱文件集》(Clarence E. Wunderlin, Jr., ed., *Papers of Robert A. Taft*)第2卷,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

⑤ 查尔斯·A. 比尔德《为美国提出一项外交政策》(Charles A. Beard, *A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阿尔弗里德·科诺夫公司1940年版,第12页。

⑥ 查尔斯·A. 比尔德《我们关于国防的困惑》(Charles A. Beard, “Our Confusion over National Defense”),《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第164卷,1932年第981期,第257页。

⑦ 查尔斯·A. 比尔德《国内的门户开放》(Charles A. Beard, *The Open Door at Home: A Trial Philosophy of National Interest*),麦克米伦公司1934年版,第213—214页。

⑧ 查尔斯·A. 比尔德《为美国提出一项外交政策》,第34、151页。

其他民族进行道德评价,“没有制度、意识形态、道德或宗教方面厚此薄彼的歧视”;相信美国没有能力,即使是出于最良好的愿望,解决其他国家棘手的问题,包括“把和平强加给欧洲和亚洲、确保在这些地区建立民主和爱好和平的政府”。^①美国政策的目标应该是“确保当前地理家园的美国人民生命的安全”,而不是国际共同体的安全,“美国陆海军的规模也应该根据这一政策而不是其他标准来决定”。^②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占主导地位的安全思想是大陆主义:相信战争的根源是经济因素,美国可以自给自足,发展西半球自足的经济体系,不需要依赖可能导致战争的对外贸易;美国参加一战是不必要的;传统的不卷入欧洲纷争的政策仍然是可行的;西半球是美国的安全防线,美国应该避免承担海外义务,专守大陆防御。^③

例外论和大陆主义反映了一战前占主导地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仍被广泛信奉的美国人关于自身文化特性、地缘政治地位和美欧关系的看法:美利坚文明是与欧洲不同的独特的文明,是在北美大陆和西部边疆锻造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欧洲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美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其安全和利益的中心在北美大陆,西半球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地理范围;美国与欧洲在文化、政治与安全上是对立的,欧洲是危险和威胁的来源,为此必须把美洲与欧洲相隔离,不卷入欧洲的纷争,同时防止欧洲对美洲的干涉;大西洋作为天然的屏障构成阻止欧洲干涉和进攻美国的“护城河”。

从美国卷入一战开始,例外论和大陆主义逐渐遭遇到挑战。美国社会出现关于美国文化特性与地缘政治身份的新叙事——“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体”。这两大叙事的出现和传播导致美国人对美欧关系的认识和自我理解发生深刻变化。

二、“西方文明”的发明与美国文化身份的重塑

以边疆理论为代表的美国例外论否定美欧之间的制度与文化联系,把美利坚文明视为与欧洲文明截然不同的新文明。但是,到二战结束的时候,存在一个由古至今延续下来的“西方文明”、美国和西欧同属于“西方文明”的观念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不证自明的常识,美国的文化身份被彻底重塑。

“西方文明”这一概念是由俄罗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在19世纪中期关于俄罗斯国家特性和身份的争论中,一派主张俄罗斯应该向英法等西欧国家学习,通过工业化和民主化实现俄罗斯的富强,这些人被称为“西化派”;另一派反对俄罗斯向“西方”学习,强调斯拉夫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是“西方”,即日耳曼-拉丁文明的对立面,这一派被称为“斯拉夫派”。斯拉夫派认为俄罗斯应该远离欧洲,保持斯拉夫文明的本质;西化派认为俄罗斯应该加入欧洲,即“西方”。受这场争论的影响,关于“西方”的观念被逐渐建构出来。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又强化了俄国(此时被视为“东方”)和英法(被视为“西方”)之间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西方文明”被界定为俄罗斯的对立面,被越

① 查尔斯·A. 比尔德《为美国提出一项外交政策》第152页。

② 查尔斯·A. 比尔德《国内的门户开放》第261页。

③ 马克·A. 斯托勒《从大陆主义到全球主义:斯坦利·恩比克将军、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和二战期间军方对美国国家政策的看法》(Mark A. Stoler, “From Continentalism to Globalism: General Stanley D. Embick, the Joint Strategic Survey Committee, and the Military View of American National Polic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6卷,1982年第3期,第304页。

来越多地与工业主义、资本主义、进步和启蒙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也恰恰是斯拉夫派拒绝的。^①随着俄罗斯和“西方”的区分越来越流行,以白种人和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文明”概念逐渐被“西方文明”概念所取代,“欧洲”逐渐成为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中这样说道:

“欧洲”一词应该从历史中剔除出去、历史上没有“欧洲”这一(文化)类型。……正因为“欧洲”一词以及由该词引出的复杂观念导致我们的历史意识逐渐地把俄国与西方视为一个统一体,而这是毫无根据的。……“东方”和“西方”是包含真正历史的观念,而“欧洲”是毫无意义的。^②

施本格勒还提出世界是由多种文化形态组成的,每种文化都是一个有机体,都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和衰亡的过程,这一过程大约持续1000年,人类的历史就是各种文化形态兴衰的历史。他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八种文化形态: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墨西哥、古典、阿拉伯和西方,^③其中西方文化诞生于公元10世纪易北河和通古斯河之间的平原上,即日耳曼人的核心地带,成熟之后不断西移,其中心从农业的北方转向19世纪晚期的城市,如伦敦、巴黎、柏林和纽约,已经进入其最后阶段——文明阶段,正在衰落,其标志是怀疑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以及城市化、庸俗的大众民主、富人统治以及官僚化,其根源在于心灵不再驱动肉体。施本格勒所说的“西方文化”指的是西欧-美国文化(West-European-American culture)。^④“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概念伴随该书的畅销得到广泛传播。^⑤

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来看,“欧洲”和“白种”的身份认同逐渐被“西方”所取代与20世纪初白种人的危机有关,包括: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战败、英国与有色人种日本的结盟以及反对欧洲殖民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运动的兴起。在这一背景下,“白种”(whiteness)与“欧洲文明”不大适合继续充当西欧人的身份标签,西欧人需要发明新的身份,于是接受了“西方”这一概念。抛弃“白种”和“欧洲”、采用“西方”的过程也是逐渐放弃以种族和自然属性来界定人群,转而采用从文化与政治的角度对人群和共同体进行区分的过程,即“去种族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明”的概念开始风行。^⑥

当“西方文明”的概念于19世纪中晚期在欧洲流行的时候,美国并不认为自己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如前文所述,自建国以来,美国在制度和文化上长期把欧洲视为自己的对立面,强

① 贾斯帕·特劳奇《“西方”的发明》,《德国历史研究所学报》2013年第53期,第91—93页。

② 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第1卷,阿尔弗里德·科诺夫公司1926年版,第16页,注释1。

③ 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卷,第18页。

④ 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卷,第3页。

⑤ 1918年《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出版,8年内售出10万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并很快被译为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和阿拉伯语,1926年被译文英语。1919年甚至被称为“施本格勒年”。H. 斯图尔特·休斯《对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的评价》(H. Stuart Hughes, *Oswald Spengler: An Estimate*)纽约1952年版,第89页。

⑥ 阿拉斯泰尔·邦尼特《从白种到西方:“种族衰退”与英国的西方观念(1890—1930)》(Alastair Bonnett, “From White to Western: ‘Racial Decline’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in Britain, 1890—1930”),《历史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第16卷,2003年第3期,第323—325页。

调美利坚文明的本土性、独特性和优越性。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一系列事态使美国人逐渐意识到美欧之间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同源性和相似性,开始把美利坚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美欧对立的思维方式逐渐瓦解。这些事态包括:大西洋两岸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英法两国的民主化导致美国和西欧的政治制度逐渐趋同,一战、大萧条和二战展示了美国与英法等国的相互依赖和安全利益的一致,美国与广大非西方世界的接触(包括非欧裔移民进入美国)凸显了美国与西欧之间的共同性。特别是一战成为美国重塑其文化身份的起点。

一战期间美、英、法三国协同作战的经历不仅使美国人意识到三国利益和制度的一致性,而且战时美国政府也有意强调三国共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乃至文化传统,以动员民众支持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以及巩固战时团结。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媒体都把与德国的战争描绘成民主与独裁、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都宣称美国和协约国是在为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而战。英法也把这场战争描绘成民主、自由和进步的西方与军国主义的、独裁、反动的德国之间的战争。这成为美国和协约国解释一战起源和协约国战争目标的标准图式。在这一过程中,自由、民主、进步和资本主义被“发明”为英、法、美的共同传统,也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特质;欧洲和美国的历史被重新阐释,美利坚文明不再是对欧洲历史和传统的背离,而是发源于西欧的“西方文明”的最新代表和最新阶段。英美主导的盟国在解释二战起源和性质时大体也使用这一话语。因此有学者把这种解释称为“协约(盟)国历史解释图式”(Allied scheme of history)。^①

集中体现这一历史解释的是战时和战后在美国精英大学广泛开设的讲授西方文明的核心课程。美国参战后,美国陆军部发起“学生陆军训练团”项目,即在大学校园里征召士兵,毕业后开赴欧洲战场,美国数百所大学大部分男学生都穿上军装在学校里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根据陆军部专门负责此事的教育与特别训练委员会的要求,“战争问题”课程(War Issues course)是训练团的必修课,课程的内容是讲述“战争的远因和近因以及战争双方各国通过政府形式、哲学和文学所体现的思想冲突”,目的是“通过让训练团的成员理解战争的性质和我们为之战斗的事业对文明的极端重要性来提高其士气”。^②陆军部要求该课程必须是一个跨学科的课程,由来自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现代文学等多个学科的教师共同策划和讲授。该课程讴歌英法美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突出三国共同的文化传统。

一战结束后,一些大学感到“战争问题”课程这种跨学科的、旨在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的必修课在和平时期应该继续开设,“战争问题”课程被改为“当代文明”课程或“西方文明”课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当代文明”课程。从1919年开始,“当代文明”成为哥伦比亚所有大学新生必修的一年制核心课程。从1929年开始,“当代文明”改为两年制的核心课程,第一年重点讲授“塑造了当代文明特性的欧洲制度与思想”,第二年“学习欧洲制度与思想对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

^① 关于协约(盟)国历史解释图式,可参见詹姆斯·库尔斯《西方文明,我们的传统》(James Kurth, “Western Civilization, Our Tradition”),《校际评论》(The Intercollegiate Review)第39卷,2003年第1—2期,第7页;诺曼·戴维斯《欧洲史》(Norman Davies, *Europe: A History*)哈珀永久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② 弗兰克·埃德洛特《学生陆军训练团战争问题课程最后报告》(Frank Aydelotte, *Final Report of the War Issues Course of the Students' Army Training Corps*),美国陆军部1919年版,第42页, <https://archive.org/stream/finalreportofwar00unit#page/42/mode/2up/search/civilization> 2018年1月17日。

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以及美国对当代文明的独特贡献”。^①

“当代文明”课程虽然也涉及其他文明,但主要内容是西方文明的历史、成就和影响,提供了一个关于西方文明演进、美国是西方文明一部分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哥伦比亚大学是进步主义史学的中心,而进步主义史学按照生物进化论的模式来阐释人类历史,把欧洲历史视为直线演进的过程,同时还强调历史研究、教学和书写为现实服务,试图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和排列来构建一个关于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用詹姆斯·鲁滨逊的话说,“历史的主要功能”是“解释我们自己的文明何以采取目前的形式”,这需要“对过去的记录重新进行拣选”,“去掉不相关的和不重要的”。^②这种辉格式的史学思想直接塑造了哥伦比亚大学“当代文明”课程的历史叙事模式,欧洲历史被描绘成一个理性主义、科学和自由理念与制度直线演进的过程,这一过程起源于古希腊,经过中世纪一直到现代欧洲,并从现代欧洲传播到全世界,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巨大影响。欧洲被解释为当代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来源,是现代性的发源地,而美国是现代性的最新发展。鲁滨逊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卡尔顿·海斯在1932年出版的流行广泛的“西方文明”课程参考书中,这样描述欧洲的历史:

两千多年以来,欧洲一直是我们一个连续不断的高级文明的所在地,我们把这一文明称之为“西方文明”,这一文明又演变为包含美洲大陆和欧洲的独特文明,后来又对“东方”的各种独特文明产生巨大影响,远远超过“东方”各文明对它的影响。^③

哥伦比亚大学的“当代文明”课程作为蓝本被其他高校借鉴,产生广泛的影响。到二战后初期,美国大多数精英大学都开设了“当代文明”或“西方文明”通识教育课程,并已经影响到美国中学的历史教育。查尔斯·比尔德1934年在美国历史学会社会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美国文明的所有方面——智性的、审美的和伦理的——一直是欧洲或‘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中学的社会科学教育应该让学生“更详尽地了解西方文明的演进”,“重点是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变化,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的演变,民主理想和实践的发展,知识和学术的积累与传播,科学、技术和发明的进步以及西方文化悠久的共同传统”。^④

杰出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回忆说,20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关于西方文明史的课程充斥在美国大学课堂,其根本思想是“无数个世纪以来,人类摸索前行,不断趋近真理与自由,它们体现在现代科学和美国风格的民主之中。……有意义的历史…是理性和自由进步的记录,而其发生地先是希

① 哥伦比亚学院当代文明课程组编《西方当代文明导论:文献汇编》(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 A Source Books)第1卷,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6年版,第vi页。

② 詹姆斯·哈维·鲁滨逊《文明的磨难》(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Ordeal of Civilization: A Sketch of the Development and World-Wide Diffusion of Our Present-Day Institutions and Ideas)哈珀兄弟公司1926年版,第4页。

③ 卡尔顿·J. H. 海斯《现代欧洲政治和文化史》(Carleton J. H. Hayes,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第1卷,麦克米伦公司1933年,第vii页。

④ 《社会科学委员会报告:结论和建议》(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Social Sciences: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纽约1934年版,第11、51—52页。转引自吉尔伯特·阿勒代斯《西方文明课程的兴衰》(Gilbert Allardyc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Course”),《美国历史评论》第87卷,1982年第3期,第709页。

腊、罗马、西欧,然后是美国”。^① 它传达的是这样的思想:美国是“文雅、理性和精致的(西方)世界的成员”,是“西方传统的继承者”,“这一传统追溯到苏格拉底,经历了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时期的种种磨难而不死”,在二战和冷战中,西方“在美国的领导下为自由、理想和宽容而战……抵御新的来自东方德国或俄罗斯的暴政”。^② 在麦克尼尔看来,“西方文明”课程“奠定了美国两代大学生和统治精英的思想基础”,“美国人所理解的西方是这些学生在西方文明课程的教室里所听到的、在教科书中读到的、在课程作业和考试中用他们自己语言所表达的西方”。^③

“西方文明”概念的提出以及“西方文明”叙事的流行深刻改变了史学界对美国历史的解释,边疆理论受到了批判。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文明”概念被用于对特纳边疆假说的批判,强调美国民主是西方文明发展的结果而非起源于美国西部的森林。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赖特在1930年撰文指出,“讨论美国民主成长的恰当出发点不是美国的西部而是欧洲的背景”,特纳边疆理论的最大缺陷就在于“把美国民主的成长与西方文明的一般进程割裂开来”。^④ 与特纳不同,赖特这样解释美国民主的成长:

美国民主运动是沿着欧洲试验和欧洲思想的路线行进的。……我们发展出的制度的大部分重要方面只有通过西方文明的演进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美国民主的大部分最重要的原则不是“来自美国的森林”,……其基本原则是从苏珊·康斯坦号带到弗吉尼亚的,是从五月花号带到普利茅斯的,是从其后的成千上万艘轮船带到美国的。如果他们带过去的是不同的原则,那么美国将会发展出不同的制度。……在(美国西部)荒远林区进行的种种极端民主试验中,留存下来并对美利坚文明产生影响的都是那些与整个西方世界发展进程最一致的成分。毫无疑问,边疆从来都不是这一过程中的唯一要素,而不过是培育美国民主的全部力量中微不足道的部分。^⑤

1945年12月27日,卡尔顿·海斯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发表主席演讲,对边疆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清算。海斯认为,特纳的理论强调边疆的决定性作用和美国“独一无二的特性”,特别是美国与欧洲的不同,对美国历史研究和自我理解产生巨大影响,导致美国“越来越强的思想上的孤立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海斯看来,在美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和签署布雷顿森林协定的时代,过去那种严格区分“新大陆”和“旧大陆”、“东半球”和“西半球”的观念已经不合时宜,这种观念不仅不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且对美国来说是危险的。民族主义过于强调美国与欧洲各国的不同,“其结果就是忽视和掩盖了这些国家文化之间的共性,即它们都属于欧洲文化或‘西方’文化,属于一个由欧

① 威廉·H. 麦克尼尔《为公民服务的历史学》(William H. McNeill, “History for Citizens”),《美国历史协会通讯》(AHA Newsletter)第14卷,1973年,第5页。转引自彼得·诺维克《那个高贵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② 威廉·H. 麦克尼尔《我们用西方指什么》(William H. McNeill, “What We Mean by the West”),《奥比斯》(Orbis)第41卷,1997年第4期,第520页。

③ 威廉·H. 麦克尼尔《我们用西方指什么》,《奥比斯》第41卷,1997年第4期,第520页。

④ 小本杰明·F. 赖特《美国民主和边疆》(Benjamin F. Wright, Jr., “American Democracy and the Frontier”),《耶鲁评论》(The Yale Review)第20卷,1930年第2期,第351页。

⑤ 小本杰明·F. 赖特《美国民主和边疆》,《耶鲁评论》第20卷,1930年第2期,第365页。

洲和欧洲的边疆——美洲的遗产、观念和利益组成的共同体”。因此，“美国的边疆是欧洲或‘西方’文化的边疆”，美国是欧洲文明的“共同后代和培育者，未来很可能是领导者”，美国历史课程的改革要更强调“西方文明”而不是“美利坚文明”。^①

那么，什么是“西方文明”？在海斯看来，“西方文明”是由下列传统构成的：

第一是希腊—罗马传统，在文学和语言、哲学、建筑和艺术、法律和政治观念等方面有丰富的遗产。第二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包括其深厚的灵性和伦理，它对个人和社会行为持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坚定地个人与民族、自由与权威、慈悲与正义、属于凯撒的和属于上帝之间做出区分。第三是在以上两大传统共同影响下产生的个人主义、有限国家、社会责任、反抗与革命的传统。第四是扩张、传教和十字军征伐的传统，这一传统……激发了一波又一波稳定地向外扩展欧洲边疆的热潮。^②

1947年3月3日，《生活》杂志发布一则启事，宣布将刊登关于西方文化历史演进的系列文章，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雅克·巴曾(Jacques Barzun)担任审稿人。启事称：与大多数美国大学一样，《生活》杂志认为不能狭隘地讲授历史课程，而应该对西方文明进行全面的考察。而“我们现代西方文明，在很多方面归功于古典的希腊和罗马，植根于中世纪，最直接从文艺复兴发展出来。……如果西方人不知道自己将走向哪里，至少可以回顾历史，看一下自己来自哪里。《生活》将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给美国人提供一种观察历史的视野，美国人需要这一视野来理解自己的过去以便决定美国的未来”。^③

“西方文明”概念和关于西方文明的历史叙事无疑为美国人提供了新的视野，告诉美国人从哪里来，他们是谁，要到哪里去，塑造了美国精英的身份意识和世界观：美国和欧洲同属于西方文明，美国是西方文明的继承者和最新代表。用亨利·卢斯的话说，美国是“西方文明所有伟大原则的继承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义、对真理的热爱和博爱的理想”。^④不仅如此，根据这一叙事，美国还是西方文明的领导者，如李普曼所言，“西方文明的主导性力量已经跨过了大西洋，曾经作为欧洲边疆殖民地的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在下一代就更加确定无疑地成为西方的地理、经济和政治中心”。^⑤在关于西方文明的叙事中，大西洋被等同于古典时期的地中海，“如果地中海长期是古典文明的内海，那么大西洋已经及时地取代了它成为西方文明的内海”。^⑥而英国和美国被类比为20世纪的希腊和罗马，“罗马对古代世界的意义、英国对现代世界的意义，就是美国对未来世界的意义。”^⑦

① 卡尔顿·J. H. 海斯《美国边疆：什么的边疆？》(Carlton J. H. Hayes, “The American Frontier: Frontier of What?”), 《美国历史评论》第51卷, 1946年第2期, 第201、206、208、210页。

② 卡尔顿·J. H. 海斯《美国边疆：什么的边疆？》, 《美国历史评论》第51卷, 1946年第2期, 第208—209页。

③ 《生活》宣布将刊登关于西方文化历史的系列文章(“LIFE Announces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ulture”), 《生活》第22卷, 1947年第9期, 第69页。

④ 亨利·R. 鲁斯《美国世纪》, 《生活》第10卷, 1941年第7期, 第65页。

⑤ 沃尔特·李普曼《美国之命运》(Walter Lippmann, “The American Destiny”), 《生活》第6卷, 1939年第23期, 第73页。

⑥ 西蒙·温切斯特《大西洋》(Simon Winchester, *Atlantic: Great Sea Battles, Heroic Discoveries, Titanic Storms, and a Vast Ocean of a Million Stories*) 哈珀公司2010年版, 第19页。

⑦ 沃尔特·李普曼《美国之命运》, 《生活》第6卷, 1939年第23期, 第73页。

到二战结束的时候,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西方文明”概念的绝大部分要素都被构建出来并被广泛接受。“西方文明”被追溯到古希腊,经历了罗马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民主革命、工业革命,一直到20世纪抵御集权主义的进攻,并在美国发展到顶峰;欧洲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而美国成为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和最新代表;希腊和罗马所代表的古典文化、基督教和启蒙思想构成西方文明的三大来源;西方文明的历史是自由不断扩展、民主逐渐成长和科技持续进步的历史,其核心价值包括理性、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私人财产、个人主义和宗教宽容。这一新的西方文明叙事是对施本格勒等人关于西方没落的回应:繁荣、先进和强大的美国成为西方文明的最新代表,西方不仅不会衰落,而且代表着人类历史的方向。这无疑有助于化解一战后施本格勒神谕般预言带给西方精英的紧张和焦虑。

毫无疑问,这一关于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忽视或有意漏掉了欧美历史上与自由和民主成长不一致、甚至相对立的史实和观念(包括阶级压迫、殖民掠夺、宗教迫害和种族清洗以及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或者把这些史实和观念视为对西方正常历史轨道的偏离。

概言之,“西方文明”成为二战后美国思考自身历史地位和国家特性的基本概念以及理解和认识国际关系的主要透镜。在19世纪,欧洲是移民逃离和美国极力躲避的地方,美国是“新迦南”。在一战时期,欧洲是美国拯救的对象,美国是“新耶路撒冷”。而到二战结束的时候,欧洲变成了“新希腊”,美国成了“新罗马”,是欧洲文明的集大成者和最新发展,欧洲与美国不再对立,而成为西方文明谱系的不同阶段。欧洲被认为对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具有极大的意义,美国卷入欧洲事务不仅必要而且正当。

三、“大西洋共同体”的想象与美国地缘政治身份的转变

一战不仅导致美国人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也成为美国地缘政治观念变化的起点。战争凸显了北大西洋地区对美国安全与利益的重要性,美国一些战略家开始重新审视美国与西欧的关系以及大西洋对美国的意义,提出与大陆主义截然不同的关于美国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角色的新叙事——大西洋主义,其核心是对“大西洋共同体”的想象。

“大西洋共同体”概念的提出者是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李普曼在1917年2月的《新共和》杂志上撰文,提出“在大西洋两岸已经形成把西方世界联结在一起的深度利益之网,英国、法国、意大利,甚至西班牙、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整个美洲就其最深刻的需要和最深远的目标而言,大体上都属于同一个共同体”,即“大西洋共同体”,而美国是这一共同体的一部分。德国已经威胁了这一共同体赖以生存的大西洋海上通道,美国不能继续“袖手旁观”,而应该为这一共同体的安全而战。李普曼还把保卫大西洋共同体与保卫西方文明联系起来,称德国“针对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战争是对一个文明的战争,而我们是这一文明的一部分”。^①

李普曼提出的大西洋主义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意涵,“大西洋共同体”成为新发明的重要地缘政治概念。这一概念融合了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的要素,把美欧之间文化相似性与利益的一致性联结在

^① 沃尔特·李普曼《保卫大西洋世界》(Walter Lippmann, “Defense of the Atlantic World”),《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第10卷,1917年第120期,第59、60—61页。

一起。通过这一概念,美国的安全开始与欧洲的均势挂钩,而这种挂钩恰恰是美国自建国后一直极力避免的。

不过,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并不热衷明显带有传统欧洲地缘政治色彩的大西洋主义,威尔逊信奉的是自由国际主义或普世主义,其战后设想是通过建立一个普遍性的集体安全组织(国联)而不是建立一个大西洋联盟来维护美国安全。凡尔赛媾和的结果以及围绕国联问题的大辩论导致美国人产生强烈的幻灭感,加上协约国与美国围绕战债问题的争吵,20世纪20年代的美人对卷入欧洲事务抱有强烈的警觉。随着大萧条的爆发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欧洲再次陷入动荡与危机之中,美国人越来越坚信,美国的安全在于与欧洲分离而不是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绑在一起。“大西洋共同体”思想在二三十年代并没有引起美国人的共鸣。

但是,随着欧洲战争阴云的加深,一些美国人又回到1917年,认识到美国与西欧联合的必要性。《纽约时报》记者克拉伦斯·斯特赖特于1939年出版《现在就联合》一书,建议大西洋沿岸的15个民主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根据美国的联邦制原则,建立一个大西洋联邦,以阻止希特勒的扩张。在作者看来,有很多“天然的纽带”把这些国家联合在一起:在地理上,这些国家除了少数不重要的例外之外,“都围绕着大西洋这一廉价、优质的交通方式”,大西洋是这些国家的“共同水域”;在经济上,这些国家之间有着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15个国家的制度和文化具有高度相似性:

我们15个国家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些民主国家的文明都是希腊-罗马-希伯来混合体与条顿-凯尔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大体上达到了相同的高度。……把这15个国家联系起来的根本的纽带是它们相同的国家观。……其共同的基础是把个人视为平等的个体,都遵循民有和民治的自由代表制政府的原则,其目标都是确保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①

该书被译为多种语言,成为大西洋两岸的畅销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北约建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美国国务院西欧事务办公室主任西奥多·阿基利斯(Theodore Achilles)回忆说,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阅读这本书,从中获得大西洋团结的理念,“如果没有《现在就联合》,可能就没有北约”。^②

二战爆发后,法国的投降和德国对英国的进攻复活了“大西洋共同体”的理念。美国重新被想象为受到纳粹德国威胁的更大共同体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与欧洲相距遥远的孤立的“山巅之城”;大西洋不再是把美国与欧洲隔离开的屏障或区隔美国和欧洲的地理界线,而是一个连接北美和西欧的共同地理与文明空间;美国也不再是一个大陆国家,而是一个大西洋强国。

1941年4月,李普曼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大西洋和美国》一文,重新强调大西洋对美国的意义。李普曼提出,“在自由政府的海权保护下,大西洋两岸和水域一直是人类自由的地理中心”,能否控制大西洋“对美国 and 整个西半球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防止具有扩张和征服野心的强国控制大西

① 克拉伦斯·K. 斯特赖特《现在就联合》(Clarence K. Streit, *Union Now: A Proposal for a Federal Union of the Democracies of the North Atlantic*) 哈珀兄弟公司1939年版,第90—91页。

② 艾拉·斯特劳斯《大西洋联邦主义与大西洋核心国家的扩大》(Ira Straus, “Atlantic Federalism and the Expanding Atlantic Nucleus”),《和平与变革》(*Peace & Change*)第24卷,1999年第3期,第291页。

洋对岸的欧洲大陆从而威胁大西洋的安全“一直是美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美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在未来扮演古典时代的罗马和现代的英国曾经扮演的角色,即“通过赋予未来世界以法律之下的秩序来为我们自己赢得伟大的和平”。^①

反映美国东北部外交精英思想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也持类似的立场。该会主席弗朗西斯·米勒在1941年7月的《外交》季刊上撰文,号召美国放弃过时的“半球主义”(hemispherism),重视大西洋,以大西洋而不是以北美大陆为中心来思考美国的战略地位。米勒认为,“三个世纪以来,美国人一直习惯于从大陆的视角来思考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相信“西半球广大的陆地是新大陆,扩张意味着向西流动和在土地上定居,在塑造国家政策中发挥作用的政治和军事控制主要局限于控制陆地”,而且“门罗主义是关于大陆而不是海洋的”。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几大事态的汇合导致“美国生活中的这个三百年时期已经结束了”,这些事态包括:北美大陆大部分土地已经被定居;航空和航海技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一个军国主义力量通过对整个欧洲大陆的征服把西半球置于危险的境地”。“这些事态汇合在一起彻底地改变了美国的地位,需要美国从根本上重新检讨美国的世界观和政策”,美国必须意识到“从战略角度来看,美英控制北大西洋是绝对必要的”。不仅如此,控制北大西洋对维护美国自由的生活方式也极为重要:

北大西洋地区是我们文明的摇篮,美国生活方式的存续取决于这一文明的存续。一千多年以来,我们的先辈一直致力于在大西洋沿岸建立一个共同的社会。他们用劳动、用信仰,必要时也用武力来建立这一社会。这一文明的基础是关于人类基本尊严的信念,这一信念通过代表制政府表达出来并受权利法案的约束。大西洋已经成为自由的海洋。只要北大西洋仍然控制在我们手中,控制在与我们有共同的精神和物质利益的人的手中,自由,无论是政治自由还是经济自由就会有在世界上继续存在的机会。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控制,我们将失去我们的自由。^②

伴随米勒的文章有一幅美国地理学会绘制的新地图,新地图把大西洋置于地图的中心,大西洋成为欧洲大陆和北美之间狭窄的共同通道。^③

英美领导人签署《大西洋宪章》后,《外交》季刊发表评论称宪章的内容不过是对国际关系中民主信念的重申,并不新鲜,“其真正意义在于签署者的身份和签署的地点”,“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戏剧性地证明了在两个国家公众的思想中大西洋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大西洋不再是障碍、护城河、鸿沟,它是高速通道,是交汇之地,是共同的通衢大道”。^④

不过,在珍珠港事件前,大西洋主义在美国仍然是少数人的主张和地区性(主要是新英格兰地区)现象,大陆主义的地缘政治观念仍然很有市场,在民众中影响巨大的孤立主义者仍然坚信大西洋是保障美国安全的屏障。美国卷入二战后,大西洋共同体的思想开始广泛传播。

① 沃尔特·李普曼《大西洋和美国:为什么以及何时介入》(Walter Lippmann, “The Atlantic... and America: The Why and When of Intervention”),《生活》第10卷,1941年第14期,第86、88、92页。

② 弗朗西斯·皮肯斯·米勒《大西洋地区》(Francis Pickens Miller, “The Atlantic Area”),《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19卷,1941年第4期,第727—728页。

③ 弗朗西斯·皮肯斯·米勒《大西洋地区》,《外交事务》第19卷,1941年第4期,第728页。

④ 杰弗里·克劳瑟《英美的危险》(Geoffrey Crowther, “Anglo-American Pitfalls”),《外交事务》第20卷,1941年第1期,第1页。

1943年,李普曼出版《美国外交政策:共和国的盾牌》一书,更加详尽和透彻地阐释了大西洋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想。李普曼指出,“在19世纪绝大部分时期很好地服务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在1900年后已经危险地不能胜任了”,但美国“未能调整其外交政策以适应形势的革命性变化”。^① 美国人民必须意识到,美国的国境线并非就是美国的防御线,美国的大陆界线“从来与美国的防务边界都不一致”,美国需要保卫的地区既包括北美大陆,也包括大西洋共同体。^②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其成员无法被排除、也不能退出的伟大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地理中心就是大西洋大海盆。”“大西洋不是欧洲和北美之间的边界,它是被地理、历史和生死攸关的需要联结起来的多国共同体的内海。”^③

卢斯创办的《时代》、《生活》和《财富》等杂志成为大西洋共同体观念的主要鼓吹者。《生活》杂志把英国比喻成古典时代的希腊,美国是罗马,大西洋就是现代的地中海。1944年6月罗马解放后,《生活》杂志的社论使用了这一类比,称“在凯撒时代,整个地中海世界是罗马统治下的单一共同体。战后‘大西洋共同体’同样可以在英国和美国的主导下结成一体,两国的亲缘关系不亚于希腊与罗马的关系”。^④

大西洋共同体的观念得到传播后,大陆主义的地缘政治叙事遭到了批判。李普曼在1940年6月的《生活》杂志上刊文猛烈批评大陆主义预设的大西洋作为屏障可以确保美国安全的观念,称过去的地理和历史教科书误导了美国人,“大西洋从来都不是确保我们远离战争的屏障”,而是“高速通道”。美国在1815—1914年享有孤立和安全不是因为大洋的屏障,而是因为这一时期欧洲没有爆发征服世界的大战以及英国对大西洋的控制,“1914年以来英国制海权遭到巨大的挑战,我们光荣孤立的时期也就结束了”。^⑤ 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尤金·斯特利在《外交事务》上撰文也认为过去美国的地理教育误导了美国人,美国人的“西半球情结”(Western Hemisphere complex)应该结束了,必须认识到大洋不是障碍,而是交往的通道。^⑥ 罗斯福总统批评美国错误的地理观念,认为美国过去“错误的地理教育”使美国人误以为几千英里的距离可以使美国永远免于欧洲战火的波及,这是一种幻想。对那些世界征服者来说,大西洋根本就不是障碍。^⑦

二战前美国使用的是墨卡托(Mercator)坐标地图,美国被置于中间,两边是大洋,这种地图夸大了大洋的宽度,强化了美国地理孤立的想象。美国参战后,墨卡托坐标地图被放弃,美国国家地理协会从新角度重新绘制地图,新地图将大西洋置于中间,从直观的形象看,大西洋从美国的“护城河”变成了欧美之间的“内海”。美国政府在战时大量分发新地图,新地图出现在《时代》、《生活》、《财富》、《外交》、《新共和》、《国家地理协会杂志》等当时的主要杂志上。罗斯福在1942年2月23日的

① 沃尔特·李普曼《美国外交政策:共和国的盾牌》(Walter Lippmann, *U. 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利特尔和布朗公司1943年版,引言,第vii页。

② 沃尔特·李普曼《美国外交政策:共和国的盾牌》,第88页。

③ 沃尔特·李普曼《美国外交政策:共和国的盾牌》,第135页。

④ 《罗马的陷落》(“The Fall of Rome”),《生活》第16卷,1944年第25期,第38页。

⑤ 沃尔特·李普曼《美国和世界》(Walter Lippmann, “America and the World”),《生活》第8卷,1940年第23期,第106页。

⑥ 尤金·斯特利《大陆的神话》(Eugene Staley, “The Myth of the Continents”),《外交事务》第19卷,1941年第3期,第481页。

⑦ 《罗斯福1940年5月10日在第8届泛美科学大会上的广播演讲》(“Radio Address before the Eighth Pan American Scientific Congress”),<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5948&st=false+teaching+of+geography&st1=> 2018年1月18日。

炉边谈话中号召美国人重新看地图,称大西洋两岸是一个整体。^①上千万美国民众聆听了罗斯福的谈话,开始使用国家地理协会的新地图。新地图重塑了大西洋与美国的地理关系,导致大西洋共同体作为一个真实的地理实体在美国人脑海中开始浮现。

李普曼等大西洋主义者在战后发展了大西洋共同体的观念,把“大西洋共同体”这一地缘政治想象建立在当时已经被广泛接受的“西方文明”概念之上,大西洋共同体成员不仅具有共同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而且被认为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制度和命运。李普曼这样说道:

美国的天然盟友是大西洋共同体国家,也就是西欧和美洲各国。大西洋和作为大西洋臂膀的地中海把它们联结在一个共同的战略、经济和文化体系之中。……在大西洋共同体毫无争议的成员国家之间存在至关重要的联系,这些联系的基础是这些国家的军事和政治位置、共同的西方基督教传统以及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制度,这些制度在各国之间会有变化和差异,但却有共同的起源并被大体相同的历史经历所塑造。^②

也就是说,美国的地缘政治身份与文明身份是一体的。福海姆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斯·霍夫曼是较早接受并使用大西洋共同体的职业历史学家。他在1945年3月发表《欧洲与大西洋共同体》一文,提出“大西洋共同体”不是虚构出来的,而是长期存在的“巨大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现实”,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继承者”。^③

同年,新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卡尔顿·海斯也呼应李普曼的思想,称美国是“大西洋共同体和作为这一共同体之基础的欧洲文明的共同后代和培育者,未来很可能是领导者”。“与作为其前身和启发者的古代地中海共同体一样,大西洋共同体是现代历史的显著事实和首要因素。……如果我们想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悲剧,确保未来几代人获得自由和民主的赐福,我们就必须再一次寄希望于这一共同体并加强我们与这一共同体的联系。”^④

海斯在二战期间担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是著名的天主教徒。海斯的主张表明公共话语已经影响到史学研究。用伯纳德·贝林的话说,“海斯的著名演讲在公共政策评论和专业史学之间架起了桥梁”。^⑤海斯本人也号召美国的历史学者“通过扩大比较研究、强调文化史和社会史同政治史和经济史具有同等重要性”来加强大西洋共同体各国之间的联系和团结。^⑥

大体说来,美国参与一战和二战推动了国内精英重新规划美国的地理空间,重新界定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发明新的地缘政治叙事,并因此激发了对美利坚共同体的新想象。地理和空间叙事同历史和时间叙事一样,都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其作用在于识别疆界、塑造公众的世界

① 《1942年2月23日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6224&st=&st1=>2017年8月22日。

② 沃尔特·李普曼《冷战》(Walter Lippmann, *The Cold War: A Study on U. S. foreign Policy*) 哈珀兄弟公司1947年版,第24—25页。

③ 罗斯·霍夫曼《欧洲与大西洋共同体》(Ross Hoffman, “Europe and the Atlantic Community”),《思想》(*Thought*)第20卷,1945年第1期,第25、34页。

④ 卡尔顿·J. H. 海斯《美国边疆:什么的边疆》,《美国历史评论》第51卷,1946年第2期,第208、216页。

⑤ 伯纳德·贝林《大西洋史》(Bernard Bailyn, *Atlantic History: Concept and Contours*) 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⑥ 卡尔顿·J. H. 海斯《美国边疆:什么的边疆》,《美国历史评论》第51卷,1946年第2期,第216页。

观、培育共同体的身份。如果说“西方文明”概念的发明把美国视为自由演进的终点和西方文明的最新代表,从而在时间坐标中重新界定了美国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身份的话,“大西洋共同体”的想象则把美国界定为跨大西洋空间的重要成员,通过拓展美国的地理空间重塑了美国的地缘政治身份。于是,大西洋两岸异质、多样、历史上曾彼此猜忌和仇恨的国家,被想象成具有亲密关系和兄弟情义的伙伴,欧洲列强不再是美国的敌人和西半球的威胁,相反,成为美国的安全盟友,美国的安全范围也不再局限于西半球,而是整个大西洋世界,和西方文明与大西洋共同体的边界高度重合。美国政治领导人开始频繁使用“大西洋共同体”概念来描述美欧关系和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①

简言之,到二战结束的时候,主张与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合作以保卫美国安全以及自由、民主和法治等价值观的大西洋主义已经完全取代突出欧美对立的大陆主义。

四、保卫“西方文明”与“大西洋共同体”:冷战与“西方”的形成

“西方文明”与“大西洋共同体”的发明和传播重塑了美国人对自身历史地位、文化特性和地缘政治身份的理解,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对美欧关系的看法,标志着新旧大陆对立观念的终结。美国在二战后对欧洲政策的巨大转变,包括提供援助促进欧洲的复兴以及承担保卫欧洲的责任,都是建立在对美欧关系的认知发生转变的基础上的。战后美欧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遏制战略的提出、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和北约的建立——都被描绘成是挽救和保卫西方文明与大西洋共同体的努力,苏联的威胁不仅是对自由生活方式的威胁,更是对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体的威胁,“西方文明”叙事和“大西洋共同体”想象成为大西洋同盟得以建立的重要话语资源。

(一) 遏制战略的出台

遏制战略的提出者乔治·凯南是一位典型的大西洋主义者,凯南在其著名的“长电报”中有18处使用了“西方”、“西方世界”、“西方国家”、“西方大国”等概念。^②在凯南看来,苏联的威胁既是安全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也是文明意义上的。凯南1947年3月在海军学院的演讲以文明和政治的双重语言来论证遏制苏联、保护欧洲的重要性,称放弃欧洲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大部分文化和传统的源泉”,成为一个在文化上“孤独”的国家。^③1947年2月27日,国务卿马歇尔与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白宫会见国会领袖,就美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问题进行沟通,艾奇逊在沟通会上提出,在两极化的世界上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就像当年雅典与斯巴达、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对抗一样,保卫西方文明,包括保卫其神圣的发源地——希腊的重任已经落到美国的肩上,美国承担起这一责任不是为他入火中取栗,而是保卫自由本身。^④在接下来的记者吹风会上,艾奇逊重申了这一论调。知名媒体人汉森·鲍德温在3月2日的《纽约时报》上对此评论称,“只要莫斯科的政府掌权,就不可能与西方文明

① 根据笔者对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美国总统项目”(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收录的历届总统公开文件数据库的检索,杜鲁门总统在其公开演讲中共11次使用“大西洋共同体”或“北大西洋共同体”的说法。<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 2018年10月7日。

② 《驻苏代办给国务卿的电报》(“The Charge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美国对外关系,194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第6卷,美国政府印刷局1969年版,第696—710页。

③ 乔治·F.凯南《回忆录》(George F. Kennan, *Memoirs*)第1卷,利特尔和布朗公司1967年版,第318页。

④ 劳埃德·C.加德纳《幻想的缔造者: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人与观念》(Lloyd C. Gardner, *Architects of Illusion: Men and Idea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1-1949*)芝加哥1970年版,第218页。

坚持两千年的价值观有真正的和持久的妥协”，“只有美国具有维护西方文明的能力”，美国“是未来命运的关键要素，凭借美国自己的力量就可以阻止西方文明的衰落，避免回到虚无主义和黑暗时代”。^①杜鲁门在10天后的国会演讲中虽然没有使用“西方文明”这一概念，而是用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语言——极权主义与自由制度的二元对立来论证美国对抗苏联的正当性，但在其心中自由制度就是西方文明的传统。杜鲁门还在演讲最后称：“如果我们拒绝援助希腊和土耳其，那么将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都将产生深远的后果。”^②五年后，一向瞧不起杜鲁门的丘吉尔赞扬前者勇敢地“从英国手中接过援助希腊的重任，遏制苏联的扩张，‘对拯救西方文明贡献最大’”。^③杜鲁门在1952年为自己的欧洲政策辩护时，也称其政府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拯救西方文明的家园免受无神主义的奴役”。^④

美国决策者把希腊视为一个在西方文明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国家，美国不能对希腊的局势撒手不管。国务院近东和非洲事务办公室主任洛伊·亨德森在1947年10月4日的公开演讲中为杜鲁门政府援助希腊的政策和杜鲁门主义进行辩护，称“我们西方世界对古代希腊亏欠太多”，因此“对现代希腊的存亡，我们有重大的国际责任”。^⑤亨德森还把共产主义对希腊的威胁类比为蛮族对罗马的入侵，赞扬希腊“在两千年前创造了我们的文明，而今天正在为维护自己的独立而斗争，正在保卫其后代抵御另一波野蛮主义浪潮的进攻”。^⑥

也就是说，保卫西方文明成为杜鲁门政府提出遏制战略的重要目标。苏联共产主义被理解成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威胁而不仅仅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国务院西欧事务办公室主任西奥多·阿基利斯回顾说，“到1947年底，马歇尔将军和贝文（英国外交大臣）先生都清晰地认识到，苏联在东欧力量已经相当强大了，西方要想让其文明存活下来，必须积累相当的道德和物质力量。”^⑦美国派往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的代表弗朗西斯·塞雷在1949年1月的演讲中明确指出，西方与苏联之间的冲突是一场文明的冲突，与苏联的斗争是古老斗争的继续，“我们有一个比维护目前的和平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拯救我们的文明”。^⑧

在这一背景下，反对施本格勒预言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美国成为名人。汤因比认为西方文明仍然充满活力，其衰落不仅可以推迟，甚至可以避免，西方的未来“主要取决于我们自己，而

① 汉森·W. 鲍德温《美国的世界角色：西方文明的存亡取决于我们的行动》（Hanson W. Baldwin, “World Role for U. S.: Survival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Held to Depend on Our Action”），《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47年3月2日。

② 《美国总统公开文件：哈里·杜鲁门，1947》（*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ry S. Truman, 1947*），美国政府印刷局1963年版，第179页。

③ 威廉·J. 贝内特《美国：最后的最佳希望》（William J. Bennett, *America: The Last Best Hope*）第2卷，托马斯·纳尔逊公司2007年版，第306页。

④ 《杜鲁门1952年10月11日在哥伦布日晚宴上的演讲》（“Truman’s Address at a Columbus Day Dinner in New York City”），<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4296&st=western+civilization&st1=2017年8月23日>。

⑤ 洛伊·W. 亨德森《美国对希腊的援助》（Loy W. Henderson, “American Aid to Greece—A Step toward Lasting Peace”），《国务院公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第17卷，1947年第433期，第772页。

⑥ 洛伊·W. 亨德森《希腊形势》（Loy W. Henderson, “The Greek Situation”），《国务院公报》第18卷，1948年第452期，第272页。

⑦ 西奥多·阿基利斯《未来世界必须看到自由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Theodore Achilles “Future World Must See Close Association of Free Nations”），《国务院公报》第22卷，1950年第549期，第52页。

⑧ 弗朗西斯·B. 塞雷《当前的国际观》（Francis B. Sayrei,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Outlook”），《国务院公报》第20卷，1949年第500期，第144页。

不是仅仅听任不可抗拒的命运摆布”。^① 1947年3月17日的《时代》周刊将汤因比作为封面人物,其照片下的解释是“我们的文明并非注定衰落”。该刊同期社论称,美国人民已经意识到“这不仅是一场政治和军事危机,而且是西方文明本身的危机”,“美国必须从英国那里接过解决当代历史问题的责任”,“保卫留存下来的基督教文明抵御威胁这一文明的力量”。^②

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拉德·索恩普在1947年10月27日发表演讲称,“看一看我们的生产力和我们对战后新的国际组织的贡献”就知道“美国不是一个筋疲力尽的国家,也不是一个开始没落的衰老文明”。^③ 直到1961年,在为即将召开的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维也纳峰会准备材料时,其幕僚还建议肯尼迪在会谈中“重申对西方充满信心,即反施本格勒主义这一主题”,强调“西方在蒸蒸日上,我们团结一致”。^④

二战后美国精英们心中挥之不去的心结就是如何挫败施本格勒的预言,证明西方文明不会衰落。美国决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保卫西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待与苏联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也是一场“文明的冲突”。

(二) 马歇尔计划

“西方文明”话语也用来支持美国援助欧洲复兴的政策,马歇尔计划被视为“拯救西方文明”的重要努力。当时的国务卿、该计划的提出者乔治·马歇尔就该计划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中,都把欧洲的复兴与西方文明的存亡联系起来。1948年1月,马歇尔在国会作证时称“无论是出于信仰还是因为继承”,美国都是西方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前西欧各国“经济困难如此严重,社会不满如此强烈,政治混乱如此广泛,而未来的希望又是如此破碎,西欧依赖自己的资源无法摆脱这一危机”,如果美国听任这种危机状况持续下去,“西方文明的历史根基将采取新的、专制暴政的形式”,“而这种专制暴政正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试图在德国加以消灭的”。^⑤

威拉德·索恩普在1947年10月的演讲中提出相似的看法,声称如果美国对欧洲的形势袖手旁观,“欧洲将出现混乱,从混乱中产生暴政,也许是共产主义,也许是复活的法西斯主义。十有八九,作为我们文明之来源的欧洲文明将毁灭,新的黑暗时代将在欧洲大陆降临,我们拥有的并且不断从欧洲文化和文明中接受的价值观将也因此而丧失”。^⑥

1947年12月19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咨文,正式提出美国援助欧洲复兴的计划。杜鲁门在咨文中提出,美国之所以要援助欧洲,既是出于“向处于困境中的人伸出援手的美国传统”,也因为欧洲的复兴对建立“健康的世界经济体系”从而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非常重要。“不过,我们对欧

① 阿诺德·J. 汤因比《历史会重复自己吗?》(Arnold J. Toynbee, “Does History Repeat Itself?”),《考验中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 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年版,第41页。

② 《挑战》(“Challenge”),《时代》(Time)第49卷,1947年第10期,第29页。

③ 威拉德·L. 索恩普:《政府政策与国际贸易》(Willard L. Thorp, “Government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国务院公报》第17卷,1947年第436期,第907页。

④ 弗兰克·宁科维奇:《现代性与权力》(Frank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 A History of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245页。

⑤ 乔治·马歇尔:《欧洲经济复兴的援手》(George Marshall, “Assistant to European Economic Recovery”),《国务院公报》第18卷,1948年第446期,第70—71页。

⑥ 威拉德·L. 索恩普:《欧洲复兴——一项为了美国的计划》(Willard L. Thorp, “European Recovery—A Project for America”),《国务院公报》第17卷,1947年第435期,第862页。

洲复兴最深切的关注,是欧洲复兴对维护我们生活方式深植其中的那个文明至关重要”。^①

在国会举行的关于马歇尔计划的听证会上,美国驻英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Lewis W. Douglas)更是明确称美国之所以必须援助欧洲还因为欧洲是“西方文化悠久的历史中心”,“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我们的个人自由的基本哲学大多都来自这一文化。”^②约翰·杜勒斯在1950年则直接称美国的援助是“为了西方文明而拯救欧洲”。^③

美国决策者和资深政界人士的这些演讲和证词实际上回答了美国民众的疑问:美国为什么要关心欧洲的命运?特别是美国联邦政府为什么要以纳税人的钱去援助欧洲?他们在纯粹的地缘政治算计和人道主义情感之外提出了足以说服美国民众的理由:援助欧洲是为了保卫西方文明的根基,也就是捍卫美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

(三)《北大西洋公约》的签订

北约的建立不仅是为了保卫欧洲各国的国土安全,同时也是为了保卫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体的安全。美国外交决策者和战略家在论证保护欧洲的必要性时大量使用战略和地缘政治语言,称欧洲对美国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一旦欧洲被一强权国家控制,美国的安全将不复存在,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光有这种战略语言是不够的,若想让民众长期接受北约,愿意承担保卫欧洲的责任,还必要使用其他话语,让民众从思想上和情感上把欧洲与美国视为一体。正是一战后西方文明叙事的流传和大西洋共同体的想象使北约的建立获得地缘政治需要以外的合法性。在美国人看来,北约的使命不仅仅是保卫欧洲这个美国地缘政治棋局中的核心地区免遭苏联的控制,还包括保卫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体,抵御东方野蛮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威胁。北约是西方文明的军事臂膀和大西洋共同体的制度纽带。《北大西洋公约》序言明确表明,缔约各方“决心保卫其人民的自由以及建立在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基础上的共同的遗产和文明”。^④

1949年3月18日,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表全国讲话,解释即将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的意义,称公约是建立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体基础上的。艾奇逊把由北美和西欧组成的大西洋共同体的历史追溯到350年前,也就是17世纪初第一批英国移民到达北美的时候。“从那时起,在我们的大西洋发展出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穿越了整个大陆,通过共同的制度、道德和伦理信仰与西欧联系在一起。”因此,“《北大西洋公约》至少是350年历史的产物,甚至是更悠久的历史产物”。“另一个团结大西洋两岸的力量是海洋生活的影响”,“与其说海洋把人们分开,不如说海洋通过贸易、旅行、相互理解和共同利益把人们联结起来”。正是在以上两大因素共同作用下,“北美和西欧实际上已经形成同一个共同体的两半,相互之间一直保持持久的兴趣”。因此,艾奇逊告诉美国人民,“北大西洋公约不是一个临时拼凑的东西,它是历史事实和教训的表达”,“我们参加了两次大战来维护大

① 杜鲁门《美国援助欧洲复兴的计划》(Truman, “A Program for United States Aid to European Recovery”),《国务院公报》第17卷,1947年第443期,第1234页。

② 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欧洲复兴计划: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80th Congress, 2d Session*),美国政府印刷局1948年版,第79页。

③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战争还是和平》(John Foster Dulles, *War or Peace*),麦克米伦公司1957年版,第105页。

④ 《北大西洋公约》(*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17120.htm, 2017年7月21日。

西洋共同体欧洲那一半的独立与完整以便维护美国这一半的独立与完整”。^① 1949年4月14日,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沃伦·奥斯丁(Warren R. Austin)在联大反击苏联对公约的指责时说:“北大西洋公约是对不断被证明的事实之正式认可,这一事实就是北大西洋两边的国家是由共同利益和民主理想构成的天然共同体。”^②

实际上,不仅美国决策者,北约其他成员国也把北约视为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体的保卫者。比利时首相兼外长保罗-亨利·斯帕克在1949年4月4日公约签字仪式上致辞说:

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西欧民主国家、美国和加拿大两次遭遇可怕的威胁,他们所代表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两次处于危险的境地。……《北大西洋公约》是展示对西方文明命运信心的行动。以践行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尊重个人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不可能衰亡。《北大西洋公约》将动用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防御手段来保卫这一文明与和平。这是我以绝大多数比利时人民的名义带着信心和骄傲签署它的原因。^③

1950年4月4日,欧洲10国外长联合致信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庆祝公约签署一周年,贺信称“公约被普遍认为是大西洋人民共同体保卫其自由和文明免遭攻击的决心的象征”。^④

1959年4月2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北约部长级会议上致辞,回忆十年前签署《北大西洋公约》时的情形。艾森豪威尔称:“(当时)面临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国家免遭军事入侵的安全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能力保卫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免遭各种无情的入侵,无论这种入侵是军事、经济还是政治的。正是由于意识到这一点北约才得以诞生。”^⑤

显然,北约是建立在关于西方的宏大叙事之上的。大西洋共同体的想象把西欧和北美塑造成同一个利益共同体,西方文明叙事则把大西洋世界共同的文化传统追溯到久远的希腊,为北约的建立提供了深厚悠久的历史与情感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北约能否建立起来是大有疑问的。针对有人提出亚洲反共国家也应该效仿欧洲签署太平洋公约、建立类似北约那样的组织,杜勒斯说道:

美国与欧洲各国人民一起工作要相对较为容易,因为我们属于同一个“西方”文明。我们的宗教、文化、政治制度、教育和生活方式大体上是相同的,其结果就是我们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思考,可以相互理解。但是当我们与亚洲各国人民一起工作时,则就大不同了。^⑥

① 迪安·艾奇逊《北大西洋公约的意义》(Dean Acheson, “The Mean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Pact”),《国务院公报》第20卷,1949年第508期,第385页。

② 《美国回答苏联对北约的指控》(“U. S. Answers Soviet Charges Against North Atlantic Treaty”),《国务院公报》第20卷,1949年第513期,第552页。

③ 《保罗-亨利·斯帕克的致辞》(“Remarks by Paul-Henri Spaak”),《国务院公报》第20卷,1949年第511期,第472页。

④ 《国务卿收到的来信》(“Messages Received by Secretary of State”),《国务院公报》第22卷,1950年第567期,第776页。

⑤ 《艾森豪威尔在北约理事会部长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Eisenhower’s Remarks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1697&st=western+civilization&st1=>, 2017年8月28日。

⑥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战争还是和平》,第229页。

著名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评论说,西方文明叙事讲述的是“自由世界的前史”。^①这一“前史”是北约得以诞生的条件。没有20世纪初期以来,特别是一战后美国精英对美国历史、文化与地缘政治身份的重新阐释,没有关于“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体”的想象,北约的建立是不可能的。

结语:通过身份建构提出国家战略

地理意义上的“西方”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文化意义上的“西方”发端于19世纪中期,而意识形态和安全意义上的“西方”直到20世纪中期才最终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文化与地缘政治身份的重塑发挥了枢纽和关键的作用。通过发明和传播“西方文明”与“大西洋共同体”话语,原本相互隔离和对立的北美与西欧被置于同一个地理和文化空间中,拥有共同的利益、文化遗产和价值观,新的美欧关系和对欧政策被合法化,作为文化、意识形态和安全共同体的大西洋联盟得以建立,一个新“西方”被构建出来。没有美国文化身份和地缘政治身份的转换和重塑,美国民众不可能全力支持美国加入“西方”,与欧洲结成长期的军事与政治同盟。此后,西方与非西方的分野成为观察和理解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直至今日。

这一过程反映出美国思考和处理对外关系的独特方式:通过阐述美国的国家特性、文化传统和国际地位来表达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以及推销外交政策,即通过身份构建提出国家战略。由于美国社会的高度多元化和外交决策权力的分散化,在不存在直接而重大国家安全威胁情况下,仅仅诉诸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话语难以在不同群体之间以及国会和总统之间就对外战略达成一致,而国会和民众的支持是任何对外政策和战略得到持续贯彻的前提。因此,美国领导人常常通过大谈美国的国家特性、价值观和理想,即通过阐释和塑造美国的国家身份来推销外交政策主张,将政策和战略包裹在理想主义辞令和对美国传统的阐释中以凝聚共识和赢得支持。本文所讨论的二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转折,特别是对欧政策的转折就是典型。通过重塑美国的文化与地缘政治身份,美国实现了自我认知和国际观念的转变,成功地加入欧洲的力量结构中去,与欧洲结成安全共同体,最终导致当代意义上的“西方”的形成。美国重塑自己文化和地缘政治身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重新理解美欧关系和提出新的对欧战略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西洋同盟的建立和“西方”的形成不仅是国家政策的产物,更是话语建构的结果。

[本文作者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杜娟)

^① 彼得·诺维克《那个高贵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第312—313页。

SUMMARIES OF ARTICLES

Wang Lixin, *The Reshaping of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West'*

When defining their own cultural identity, the Americans had long embraced the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considered Europe the cultural antithesis and the 'other' to America since the late 18th century. In America's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Europe was regarded a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the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impelling the U. S. to pursue the continentalism with an emphasis on keeping distance from the European disputes and repelling the European penetration in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American elites started a process of reshaping the America's self-understanding and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cultural and geopolitical identity by substituting the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for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narrative, which stresses the homology and similarity between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culture, as well as by disintegrating the continentalism through inventing and spreading the concept of the Atlantic community, which imagines the common tradition, interests and fate between the U. S. and Europe.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in virtue of this new national identity, the U. S. explained 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founding of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as the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Atlantic community, aiming at safeguarding the American culture and security. This successfully forged the U. S. and Western European nations into a cultural, ideological and security community, eventually creating a new 'West'.

Jin Hai, *The Jay Treaty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American Independenc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endowed a completely new content to 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turning it from metropolitan-colonist relation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wo independent nations. Both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governments must deal with the issue of regulating their relations. The objects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ere to make the United States become a responsible memb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under the guidance of Great Britain, and accept the British influence as much as possible, even its leadership. On the other hand, the objects of the American